

7個月，而本文想藉由該社在這短時間內的活動，從而證明學生在社會地位上的迅速提升現象是很有限的。加上五四後社團仍持續運作3年多，至1923年之後社團才停止營運。<sup>27</sup>若撇開「五四」後的作為不談，似乎無法把新潮社的整體活動完整呈現。但筆者相信，採用這種探討，還是能證明北大學生於「五四」前投身的活動，是奠定了他們在五四運動中一呼百諾的基礎。同時，筆者也希望藉著這種討論，能將清末至五四新文化運動間學生社群在社會變遷上的作用，做一個完整的銜接。

## 新潮社的成立始末

在胡適、陳獨秀於1917年初先後喊出了「文學革命」的口號後，新文化運動便正式邁向一個新階段。筆者認為，文學革命口號的宣示，在新文化運動內部同樣起到類似王汎森先生所言「轉轍器」的作用，讓新文化運動有更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。<sup>01</sup>此一時間點，也正值蔡元培甫出任北京大學校長。又蔡元培在北大陸續所推行的改革，使得民初以來被外界視為老爺機構的北大，校風為之一新。而北大更是日後成為新文化運動推行者的陣營。所以，蔡元培在北大推行的校園改革，與新文

27 新潮社主要社務是以發行《新潮》雜誌，《新潮》雜誌最後一期（3卷2號）是在1922年3月出版。但在發行雜誌外，他們在社團後期社務中，還有人文叢書的編輯。所以，若加上新潮社在1923年才編纂完成的《1920年世界名著特輯》，他們真正停止社務運行的時間，當在1923年以後。魯迅，〈《中國新文學大系》小說二輯序〉，轉載於馮克立等編，《魯迅序跋集》（濟南：山東畫報出版社，2004年），頁586-603。

01 王汎森先生論這段期間整個大的中國全部環境的社會政治條件，造就出新舊文化得以遞嬗的可能性，並拿此種社會政治條件比喻為火車的「轉轍器」。筆者借用他的論點，認為若只談新文化運動本身，文學革命口號的提出，同樣對新文化運動後來的發展起到了「轉轍器」的效能。王汎森，〈思潮與社會條件——新文化運動中的兩個例子〉，《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社，2003年），頁241。

化運動發展是有密切關聯的，而也是這種改革才讓新潮社得以誕生。本章內容，重點即在於探討 1917 年以後蔡元培接手北大校長後的改革，藉由這個校風轉變的背景，來探索新潮社成立的詳細過程，並從中看出北大校園改革與新文化運動發展的相連之處。

## 第一節 北京大學 1917-1918 年的校風轉變

前身為清末京師大學堂的北京大學，其校園轉型的歷史是相當特殊的。在京師大學堂時代，這所學校的經營方針，被設定為向政府供輸人才的官僚養成所。進入民國之後，先後擔任校長的嚴復（1853-1921）等人，都試圖對北大進行了教學內容或經營走向上的改變，<sup>02</sup>但直到蔡元培擔任該校校長後，北

02 北京大學進入民國後至蔡元培到任中間這段時間，擔任校長者依次為嚴復、馬良（1840-1939）、何燏時（1878-1961）和胡仁源（1883-?）。他們在任期間或多或少都有對學校進行過整頓，並有拓展學校規模的貢獻。而關於他們的改革內容，可以參見蕭超然的介紹。蕭超然等編，《北京大學校史 1898-1949》（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，1981年），頁 1。此外，像舒衡哲與陳萬雄的研究裡，談到嚴復和胡仁源，在試圖改變當時北大校內桐城派獨大的現象上，做過一番努力，也為蔡元培日後整飭學風打下基礎，而這兩人在研究中都有論及這對蔡元培改革北大的影響。而這兩位元學者，也曾就這部分作出有系統的整理。舒衡哲（Vera Schwarcz）著、劉京建譯，《中國啟蒙運動——知識份子與五四遺產》（臺北：桂冠圖書，2000年），頁 34-41。陳萬雄，《五四新文化的源流》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1997年），頁 24-28。

大的校園改革才真正邁向另一階段，並真正轉型為類似西方現代化高等學術機構的大學模式。<sup>03</sup>此時約在 1917-1918 年間，正好是新文化運動逐漸走向多元化發展的時期。所以，有必要針對蔡元培在此時所著手的北大校園改革做一番介紹，以便瞭解之後新潮社成立的背景。

### 一、蔡元培在北京大學的改革

關於蔡元培所進行的北大校園改革，由於歷來已有許多詳細且完整的整理。<sup>04</sup>因此，筆者便不多贅述，僅針對改革與校風轉變有直接關聯的部分加以介紹。

03 蔡元培擔任校長前的北大變遷與發展，目前中外已有不少相關的研究。早期以蕭超然先生所做的整理最為詳盡。他將北京大學從京師大學堂時代到北京大學的校園學術風氣、校園體制變化作了通盤的介紹。可參見《北京大學校史 1898-1949》，頁 1-44。而近期的研究中，近期的旅美學人林小青，在她針對北京大學 1898-1937 年間的專門研究中，也以兩個時代斷限（1898-1911 及 1912-1937），來探討有關蔡氏擔任校長前，北大內部的學術變遷。見 Xiaoqing Diana Lin（林小青），*Peking University: Chinese Scholarship and Intellectuals 1898-1937* (New York: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, 2005), pp25-64。

04 在目前研究蔡元培北大校園改革的學者中，以陶英惠所做過的研究即可為代表。陶英惠曾寫了一篇專門介紹蔡元培對北京大學改革的研究。見陶英惠，〈蔡元培與北京大學〉，載於張玉法等編，《中國現代史論集【第六輯 五四運動】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社，1990年），頁 365-428。除陶英惠外，在蕭超然所寫有關北京大學的研究裡，也用了不小的篇幅，來介紹蔡元培在 1916 年接掌北大校長後如何改革北大。見蕭超然，《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5年），頁 64-164；和蕭超然等編，《北京大學校史 1898-1949》（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，1981年），頁 33-47。

1916年底，蔡元培奉教育部令出任北大校長後，他就開始籌劃北大改革的工作。改革的目標，在於改變外界對北大的印象。當時外界普遍對北大的印象為何？他在和上任之際與吳稚暉（即吳敬恆，1865-1963）的書信中便有提及，而此正是蔡元培為何想對北大進行整頓的原委，他說：

茲有啟者，弟前已北京大學問題，商於先生。……弟到京後，與靜生、步洲等討論數次，覺北京大學雖聲名狼藉，然改良之策，亦未嘗不可一試，故允為擔任。<sup>05</sup>

他的言論，說明瞭1917年之前的北大，外界是以「聲名狼藉」的眼光來看待這所大學，可見北大當時的形象是相當糟糕的。然北大為何「聲名狼藉」？具體的原因，當時剛升為北大正式學生的顧頡剛，回憶中有提到敗壞北大形象的具體例子：

那時的北大實在陳舊的很，一切保存著前清「大學堂」的形式。教員和學生，校長和教員，都不生什麼關係。學生有錢的儘可天天逛妓院、打牌、聽戲，校中雖有舍監也從不加干涉。<sup>06</sup>

05 蔡元培，〈覆吳稚暉函〉，1917年1月18日。見高平叔等編，《蔡元培文集》【十】（臺北：錦繡出版社，1995年），頁376。

06 顧頡剛，〈蔡元培先生〉，《責善》1卷1號，1940年3月16日。此文

另外，當時同是北大學生，並為與新潮社並駕齊驅的國民社，核心成員之一的許德珩（1890-1990），更於回憶中淋漓盡致的描述了校風腐敗的情形：

北京大學在蔡元培先生未任校長以前，腐敗到了極點。其所以腐敗，是因為京師大學堂在初辦時，設任學、師範等館，所收的學生都是京官。……後來校風雖逐漸演變，而官僚習氣不能滌除。學生年紀大的相當多，其中還有舉人、秀才出身的。他們管校內工友稱“聽差”，工友稱呼他們為“老爺”，以後也是管他們叫“先生”。……這些有錢的學生，帶聽差，打麻將，吃花酒，捧名角，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，對研究學問毫無興趣，讀書就是為了作官。所以專門研究學術的教員，他們不歡迎。上課點名認真一點，考試嚴格一點的教員，他們就藉故反對。……因此，教員中不少人不學無術，吃飯混日子。講課是陳陳相因，敷衍塞責，每年把前一年的講義照樣印出來，按期分散給學生，在講壇上讀一遍。<sup>07</sup>

這兩位現代史上的知名人物，他們對自己在北大求學的回

……  
並可與顧頡剛女兒顧潮女士整理其父生平事蹟的專書內容相互參照，兩書皆比照了蔡元培到校前後校風的不同，並有可互補之處。顧潮，《歷劫終較志不灰：我的父親顧頡剛》（上海：華東大學出版社，1997年），頁40。

07 許德珩，《許德珩回憶錄：為了民主與科學》（北京：中國青年出版社，2001年），頁18-19。

憶，都不約而同地道出蔡到任前的北大師生品德敗壞狀況。富家學生去聽戲、逛妓院、打麻將，不學無術，甚至抵制認真教學的教員，老師們多半也是因循苟且得過且過。<sup>08</sup>類此不良行徑，的確讓北大校譽於當時日漸低落。其他還有不少相關人士的回憶，對蔡到任之前的北大，都給了負面評價。<sup>09</sup>

有鑑於此，蔡元培在上任北大校長的就職演說中，就提到他希望在其擔任校長後，未來學生除求學外，還必須遵守「抱定宗旨、砥礪德行，及敬愛師友」這三項他為北大學生量身訂作的守則。<sup>10</sup>而這三個守則，更可視作是蔡元培在整頓校風上的最終目標。

然而，若要讓一種環境或機構，得以轉型成截然不同的風格，一般說來是須藉由多種管道著手才能實現。所以，蔡元培在執行改革的過程上，除利用校長權威作制度面的變革，也搭配一些柔性開導方式，利用多重的管道，才逐漸讓北大的校風

08 甚至像顧頡剛本人，回憶他在1913年剛就讀北大預科時，就言當年他為了聽戲多次翹課（他稱北京的伶人他當時幾乎全看過了，且迷上戲劇的時間長達兩年多），造成他那時學業上的荒廢，由此可見當時北大環境的糜爛，對於學生學習態度上的影響。顧頡剛，〈自序〉，《古史辨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店，1992年再版），頁19。

09 其中，以羅家倫形容最為生動。他說改革前的北京大學，在社會上風評之糟，甚至被外界戲稱「北京出名的八大胡同裏，談到光顧的客人，則首稱『兩院一堂』。兩院是參議院跟眾議院，一堂便是京師大學堂」。見羅家倫，《逝者如斯集》（臺北：傳記文學出版社，1987年），頁2。

10 蔡元培，〈就職北京大學之演說〉，1917年1月9日。見高平叔編，《蔡元培全集》【三】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4年），頁5-7。

能夠徹底轉變。而他採用的模式，或許用軟硬兼施來形容更為貼切。

這種軟硬兼施的態度，其實在蔡元培北大的就職演說中已可看出。演說上論「抱定宗旨」、「砥礪德行」、「敬愛師友」三目標中的砥礪德行時，他談到砥礪德行的方法，除要求學生在課堂上須認真學習，也說學生在課外閒暇之餘，也應從事適當的娛樂來調劑身心（但前提需為正當的休閒活動）。要求學生在上課之際認真學習是「硬」，言學生可在課餘時間享受正當的休閒活動是「軟」，柔性的動之以情，加上剛性的說之以理，這種論述方法是很能獲得大部分人的認同。在剛柔交互應用的架構下，他的演說後段提到了「諸君終日伏首案前，芸芸攻苦，毫無娛樂之事，必感身體上之苦痛」，感同身受地贊成學生應該要有休閒活動，但又言「為諸君計，莫如以正當之娛樂，易不正當之娛樂，庶於道德無虧，而於身體有益」，以一點類似訓示的口吻，要學生從事的娛樂活動必須合乎道德規範。<sup>11</sup>

從蔡元培的北大就職演說中，我們可看出他到任之際已有改革的具體想法，從中並也了解他想以軟硬兼施的方法，來達成改革目標。因此，1917年至1918年這兩年間，蔡即是透過此方法落實北大校風改革。在過程中，他採取以下的做法，來

11 蔡元培，〈就職北京大學之演說〉，1917年1月9日。見高平叔編，《蔡元培全集》【三】，頁5。



貫徹他的軟硬兼施改革理念。

在硬性的做法上，蔡元培藉由校長的權威做制度面的變更，設置了不少新的校園機構來管理校園內各項事務。其中，他任內所設立的北京大學評議會，更是其透過硬性管制的辦法，來改變校園風氣的一關鍵機構。

有關評議會的由來，須追溯至蔡元培在 1912 年任南京臨時政府的教育總長時，其頒布《大學令》當中條文的概念。<sup>12</sup>在蔡元培卸去教育總長的職務後，仍然希望透過這種方式提振大學的學術品質。直至他接任北大校長後，他的評議會構想才真正落實。他把北京大學評議會，定位為校內最高的立法與權力機構。<sup>13</sup>成員以北大各科的學長、及所有教授裡選出的評議員所組成，校長並為該會的當然會長。北京大學評議會，約每個月開會一次，會議內容主要有：各學科設立及廢止、講座之種類、大學內部規則、關於學生風紀事項、審查大學生成績及

12 蕭超然，《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》，頁 43。而蔡元培任教育總長時期制定的《大學令》，重點在於：（一）規定大學以教授高深學術、養成碩學宏材、應國家需要為宗旨（二）大學將所有學科分為七門，並廢除經學科（三）高等學堂改為大學預科（四）改通儒院為大學院，且不限定年限（五）大學畢業生稱學士，取消以科第為主的獎勵辦法（六）大學設校長，各科設學長，代替清末以來沿用的總監督與各科監督（七）教師分教授、助教授二等，必要時可延聘講師（八）大學設評議會，處理全校行政事宜（九）各學科設教授會，處理該科的行政事宜。所以可見大學評議會，源自於蔡元培《大學令》規章中的構想。蕭超然等編，《北京大學校史 1898-1949》，頁 34。

13 蕭超然等編，《北京大學校史 1898-1949》，頁 42。

請授學位者之合格與否、教育總長及校長諮詢事件、及關於高等教育事項將建議於教育廳長。而制定、審核校內所有規範及條令，且審核教師的頭銜、評定學生的成績與操守更是該組織的主要目的。<sup>14</sup>所以，藉著此一有系統機構的設立，得以用強硬的管理審核方式，來整飭被視為是不良的行為來改變校風。

在軟性的做法中，蔡元培運用了誘導的方式，他在校內大力提倡好的娛樂，希望藉此導正學生的品德。<sup>15</sup>而在好娛樂的提倡辦法上，蔡採用了兩個方式其一是發起校園社團，透過社團活動讓學生從事正當育樂及休閒，以匡正學生涉足不良場所之歪風。其二是倡辦各種校園刊物，鼓勵全校師生投稿，並誘使學生從事學術研究的興趣。

關於社團部分，至 1917 年底北大校內已陸續出現許多課餘團體，它們的創社幾乎都與蔡有關，其性質也都符合其所提倡的「正當之娛樂」（見表 2-1）。這意味著：蔡事先就已篩選過社團的活動內容，讓這些娛樂項目不會超脫道德常規。而在所有社團的活動均標榜正當娛樂下，讓學生逐漸感染這股良

14 〈大學評議會規則〉，載於吳相湘主編，《民國史料叢刊 5· 國立北京大學廿周年紀念冊》（臺北：傳記文學，1971 年），頁 121。而蕭超然先生的研究，也針對該篇規範中較不清楚的部分加以解釋，因此與該規範可互相作為參照。蕭超然，《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》，頁 43。

15 陶英惠先生的研究中，也曾點出蔡元培提倡好娛樂的想法，但他沒有針對這部分更深入研究。陶英惠，〈蔡元培與北京大學〉。見張玉法等編，《中國現代史論集》【第六輯 五四運動】，頁 388。

善的風氣。至 1918 年，該年在校內新成立的社團中，更有一些的社團宗旨，能和新文化運動相互接軌（如本章第二節將會談到的進德會）（見表 2-2）。所以，蔡元培引入多元且正當的社團活動，是一種有效的誘導方式，讓北大校內保守腐敗的校風得以轉型。

至於在創造校刊上，先是在 1917 年初，蔡元培為了使發行校刊能夠順利進行，他於校內設立了一名為出版委員會的機構。此機構的業務，即負責出版校內所有的書籍與雜誌。<sup>16</sup> 約同一時期，他也設立了北京大學編譯處，負責編譯各項書籍，藉此提高北京大學學生閱讀刊物及查詢資料的興趣。<sup>17</sup> 在前置的相關作業陸續完成後，1917 年冬季，北京大學評議會決議設立《北京大學日刊》。同年的 11 月 16 日，北大的首份校園刊物就此誕生。至 1918 年 9 月，蔡元培和北大校內評議會又決定推出另一全校性質的刊物《北京大學月刊》，目的則為了補《北京大學日刊》之不足。此刊則於 1919 年 1 月正式推出，內容重點則偏重於學術研究上的交流。<sup>18</sup> 透過這類全校性質刊

物的發行，也使校內多了學術交流的管道，更帶動了校內的學術研究氣氛。

表 2-1：1917 年國立北京大學校園內社團性質分類

社團活動主軸	社團名稱
與課業相關的學術研究社團	英文研究所、哲學研究所、國文研究所、國學研究所、數學研究所、理科研究所、理科化學演講會、化學研究所、物理研究所
同鄉會性質的社團	山東同鄉會、江蘇同鄉會、江西同鄉會、陝西同鄉會、廣東同鄉會等
藝術研究與創作的社團	音樂會、書法研究社
運動性質的社團	技擊會、體育會
訓練口才的社團	雄辯會、英語辯論會
其他未歸類	靜坐會、閱書報社、北京大學消費公社

資料來源：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7 年 11 月 25 日－1918 年 1 月 19 日。及李惠惠，《新潮雜誌與新文化運動》（臺北：國立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85 年），頁 312。

16 蕭超然等編，《北京大學校史：1898-1948》，頁 42。

17 〈北京大學編譯處簡章〉，《民國史料叢刊 5·國立北京大學廿周年紀念冊》，頁 133。

18 關於此月刊創辦的來龍去脈，1918 年 10 月 5 日的《北京大學日刊》和該刊創刊號中，都有一番簡介。〈編輯北京大學月刊緣起〉，《北京大學月刊》1 卷 1 號，頁 1-2。蔡元培則另有小啟事來說明此刊的內容走向為何。蔡元培，〈蔡元培啟事〉，《北京大學月刊》1 卷 1 號，1919 年 1 月。而蕭超然在做北京大學校史時，也曾對此部分做了較清楚的整理。

蕭超然，《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》，頁 79-80。

表 2-2：1918 年整年在國立北京大學成立的課餘團體

社團名稱	正式發起時間	社團宗旨	發起人
進德會	1918.1.17	培養個人注重自我道德規範的社團	蔡元培
畫法研究會	1918.2.1	研究中西畫法及磨練繪畫技巧	蔡元培
哲學會	1918.3.2	以商榷東西諸家哲學論起新知為宗旨	陳鍾凡、黃建中、江紹祖、馮友蘭等共 14 人
校役夜班	1918.3.18	以北大教員及學生所專長，來分教校內未受過教育的校役	蔡元培
新聞研究會	1918.7.4	灌輸新聞知識與培養新聞人才為目標	徐 璜
樂理研究會	1918.7.18	為舊有音樂會之改組	夏宗淮
國民雜誌社	1918.10.13	以增進國民人格、灌輸國民常識、研究學術、提倡國貨為宗旨	
衛生學會	1918.10.14	促進北大職員與學生公共衛生與個人衛生	蔡元培、夏循、周象賢、貝熙爾、陳世璋、陳鵬、李煜瀛 7 人
數理學會	1918.10.25	研究西方最新的數學物理學為主，並會刊行雜誌	吳家象、吳維清、毛準、劉翼章等共 17 人
新潮雜誌社	1918.12.3	以介紹西洋近代思潮、批評中國現代學術上、社會上各問題為職司	傅斯年、羅家倫、顧頡剛、張崧年、康白情等共 21 人

資料來源：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8 年 1 月 11 日－12 月 24 日。及蕭超然，《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》，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5 年 12 月），頁 78-111。

## 二、改革後北大校風的蛻變和轉型

在蔡元培推動的改革陸續實行後，北大校園風氣也開始有了正面的轉變。這種轉變，除使北大的校園風氣更為自由、開放外，也讓北大的形象跟學術水準得以提升。而這些正向的風氣，更是形成了日後新潮社能在北大成立的有利環境條件。

而北大校風的蛻變與轉型，正好可透過《北京大學日刊》這個記載每日各項校內各種動態的刊物，來看出北大校風的變化。而這部分，可從該刊記載的兩種內容看出。

其一為記載行政制度變動的內容。這些紀錄包括公共規範、行政規章、公眾組織等公共事務的更動。從這些公共事務的議定，可看出大校風正朝好的方面轉變，學術風氣、師生品德操守等，都因這些公共事務的變更而有所提振。

例如，對於帶起北大學術風氣上，當時最重要的公告，為《北京大學日刊》創刊號【紀事】欄裡刊載的研究所通則。當天公告中，宣佈成立國文、英文、哲學（以上文科）、數學、物理、化學（以上理科）法律、政治、經濟（以上法科）共九門的研究所。而各科的研究主旨上，國文所研究主軸是文字學與文學；英文所是名家著述提要與名家研究；哲學所是心理學、論理學、中國哲學；理科各門是研究科學史、譯名審定、中國舊學鉤沉等；法科法律所研究主軸是各國法律比較、學說異同、評名著研究、譯名審定；政治及經濟門則是名著研究及譯名審

定。<sup>19</sup> 另外，在該通則中更開宗明義的指出這些研究所都須肩負起研究學術、研究教授法、特別問題研究、中國舊學鉤沉、審定譯名、譯述名著、介紹新書、徵集通信研究員、發行雜誌、懸賞徵文這十大要務。<sup>20</sup>

不過，最初設立的研究所，大致上還在草創階段，最初更類似於現今教育體系裡課後輔導性質的社團組織，只要報名經許可後即能加入，至 1920 年以後才有更進一步的甄選規劃。即便如此，公告內容仍能反映出研究所成立的主要任務，目的就是帶動學術研究風氣。在此之後，各研究所更各自發展出不同的面貌，並陸續在自己的研究所裡，設立了如演講會、出版部等能增加學術研究空間的組織。而他們的研究主題，也都定期會在《北京大學日刊》上公佈各所的會議紀錄與研究成果。像新潮社中的傅斯年、俞平伯、康白情、潘元耿學生，這段期間都成為了研究所的成員，研究所的學術討論內容他們也曾參與（其名都曾在《北京大學日刊》的研究所會議紀錄中出現過），<sup>21</sup> 也可看出研究所中所帶動的學術討論氣氛，對新潮社日後的走向更產生影響。

除研究所通則外，1917 年至 1918 年，在校方陸續頒布重

19 〈研究所通則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7 年 11 月 16 日，【紀事】。

20 〈研究所通則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7 年 11 月 16 日，【紀事】。

21 尤其是在《北京大學日刊》創刊後 1 年多的時間，各研究所的平時活動都會相當清楚的紀錄在日刊上。見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7 年 11 月 16 日-1918 年 12 月 29 日，【本校紀事】。

大行事命令中。有些更是讓北大教學品質及學術風氣日後能提升的關鍵。

如在 1917 年 12 月 6 日，校方開會通過教授減發講義案，這項議案除了避免浪費及節省經費外，主要還是為了改革前面許德珩所述北大一些教授的劣質教學心態。該決議明確指出「各科目凡有適宜之教科書者，一概用教科書為藍本，不另發講義」。<sup>22</sup> 1918 年 2 月 18 日並作出更新，宣佈在 1918 年暑假後的新學期，全校教員一律停發講義。<sup>23</sup> 筆者認為這個議案，讓北大教學品質得以提振。

而北大在 1917 年下半年也曾有一段時間，校內瀰漫著匿名攻訐之風。<sup>24</sup> 為遏止這股歪風逐漸擴大，蔡元培在 1917 年 12 月 19 日的《北京大學日刊》上，發布了〈禁止匿名揭帖〉的公告，說以後凡查出匿名攻訐者，一律開除學籍以敬效尤。<sup>25</sup>

22 〈減發講義案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8 年 12 月 6 日，第 1 版，【紀事】。

23 〈本校致全校教員公函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8 年 2 月 18 日，第 1 版，【本校佈告一】。

24 像胡適剛進北大教學時，其內容太新穎。有許多年紀比胡適還長的學生不服，便私下發起要趕走胡適的運動。見顧潮，《歷劫終較志不灰：我的父親顧頡剛》，頁 41。甚至如傅斯年，這段時間也曾用匿名批評的手法，批評過一個他不滿的教授。羅家倫，〈元氣淋漓的傅孟真〉，《逝者如斯集》，頁 166。

25 蔡元培，〈禁止匿名揭帖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7 年 12 月 19 日，第 1 版，【校長公告】。



另外，有鑒於北大法科師生上課態度特別不認真，特別是該科學生動輒無故缺席，甚至還有教員在上課鈴響後三十多分鐘才上課。為了避免這種不良的風氣帶壞其他學科的師生，校方便在1918年2月7日的《北京大學日刊》公告，規定法科學生及教授需在上課鈴響後十分鐘內到齊及開課，且下課鈴響前不准擅自離開教室，否則一律以曠課計。<sup>26</sup>

以上幾項刊登在《北京大學日刊》的公告，筆者認為是至關重要的幾項校園決議。這使得北大的風氣有效地被整頓了，並讓北大能逐漸擺脫「陳陳相因」的陋習。

其二則是師生個人在《北京大學日刊》發表的文章。在這些個人文章中，有些可以看出北大校內的言論，在這段期間逐漸朝「百家爭鳴」卻又「相容並包」，多元化及自由化的方向發展。當中有個最恰當的例子，是胡適的〈爾汝篇〉在1918年2、3月間所引起的討論。

身為日刊編輯之一的胡適，<sup>27</sup>於1918年2月5日及6日連續兩天，在《北京大學日刊》上刊登了他在美國所寫的〈爾汝篇〉一文。此文胡適針對「爾」跟「汝」二字的區別及用法，

賦予新的闡釋，並以英文文法加強他的論點。<sup>28</sup>文中胡適將「爾」「汝」兩字重新定義，他借用英文修辭及文法的觀點，認為「爾」表多數，而「汝」表單數，且「爾」較偏形容詞或代名詞，而「汝」則較似單數的名詞，他並引用中國古典文學中的片段來支持自己的觀點。<sup>29</sup>

胡適此文的看法與中國文字的傳統觀念迥異，直接挑戰了行之多年的中國文字學。所以，在1918年2月8日《北京大學日刊》發出邀請讀者投稿的公開聲明後的隔天，<sup>30</sup>就有同為教員的講師劉勳和（少珊），針對胡適這篇文章寫下不同意見的〈書爾汝篇後〉一文，以傳統中國文章書寫的習慣用法，及他個人的觀點來質疑胡適〈爾汝篇〉一文的立論。其中，劉勳和從《尚書》中找到「邦之臧為汝眾」及「凡爾眾其為致告」這兩段話，來證明「汝」字在中文的用法也可以當作多數名詞使用，並以此來反證胡適的見解有誤。<sup>31</sup>劉勳和此文從2月9日一直連載到18日。由於劉的意見確實中肯點出了〈爾汝篇〉一文的缺失，因而胡適也在該文連載結束時，附上一篇表達感

26 〈校長佈告一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8年2月7日，第1版，【本校佈告】。

27 當時《北京大學日刊》的編輯群，編輯主任是為徐寶璜（1894-1930），而在胡適外，負責編輯者尚有陳獨秀、沈尹默（1883-1971）和孫國璋，他們當時皆為北大校內的教授。〈北京大學日刊編輯一覽表〉，《民國史料叢刊5·國立北京大學廿周年紀念冊》，頁222。

28 胡適，〈爾汝篇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8年2月5日-2月6日，第4版，【著述】。

29 胡適，〈爾汝篇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8年2月5日-2月6日，第4版，【著述】。

30 〈北京大學日刊投稿簡章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8年2月8日，第2版，【本校重要紀事】。

31 劉勳和，〈書爾汝篇後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8年2月9日，第4版，【文藝】。

謝之意的短文。<sup>32</sup>

而在劉發表質疑胡適〈爾汝篇〉的文章後，又有北大數學門學生毛準（即毛子水），在2月22日及23日兩天，發表了〈書爾汝篇後〉一文。毛準此文意在支持胡適的〈爾汝篇〉敢於用新觀點挑戰傳統的精神而作，<sup>33</sup>雖然其見解不見得與胡適同。此文他引用許多佐證來表達自己的看法，例如他用音讀演變的方式證明「爾」、「汝」二字聲位大致相同，所以早期的字義也無異，但經過一段時間的演變，兩字在用法上逐漸產生細微差異。<sup>34</sup>刊出後隔天，他再補上〈書（書爾汝篇後）後補〉一文，針對前文音讀部份作進一步補充。<sup>35</sup>

劉焯和、毛準先後對胡適〈爾汝篇〉的一文發表回應文章後，北大校內素來保守色彩濃厚的文科教授陳漢章（1865-1938），亦於3月2日在《北京大學日刊》上發表〈爾汝篇卮言一則〉，寫下自己對「爾」、「汝」兩字用法的意見。此

32 劉焯和，〈書爾汝篇後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8年2月18日，第4版，【文藝】。

33 此文中，毛稱許胡適「欲引檀弓中之一節，以証古人爾汝二字之異用」的求證及創新精神，並且在文末說「吾所言者，非有心得，大都前人所已道過。所以不避煩厭者，正程子所謂『大家求個是處』之意也」，來表明他撰寫此文的用意。毛準，〈書「書爾汝篇後」後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8年2月22日-2月23日，第4版，【文藝】。

34 毛準，〈書「書爾汝篇後」後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8年2月22日-2月23日，第4版，【文藝】。

35 毛準，〈書（書爾汝篇後）後補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8年2月25日，第4版，【文藝】。

文對胡適、劉焯和、毛準三人意見的高下未多加批判，而是也利用文字的讀法，對這兩字的使用提出另一種看法。<sup>36</sup>文末陳漢章更幽默地引用孟子「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，無所往而不為義，於焉循爾汝之名，責爾汝之實」這段話，來問胡、劉、毛三人此段的「爾」「汝」該怎麼解釋？<sup>37</sup>

這場持續近一個月的中國文字學辯論，最後雖未分出高下，但在這場筆戰之中我們看到幾位北大人不作人身攻擊，不興惡意攻訐，就事論事的君子之爭，除為當時學界樹立了高格調的學術討論風範外，並為北大日後之所以能成為全國自由學府的殿堂，奠定了良好的基礎。

除這場1918年春季的學術論戰外，像是1918年10月，傅斯年在《北京大學日刊》上發表己見，批評北大學科體制中的哲學門不應放在文科，而應放在理科。<sup>38</sup>而這種挑戰校方制度的文章是很敏感的議題，然校長蔡元培用很有雅量的態度，公開稱讚了傅斯年的創新看法。顯見在蔡的努力下，校內正塑造出一種「百家爭鳴」的自由言論空間。此外，1918年下半年，北大教授劉復（1891-1934），更代表校方公開徵集近世歌謠

36 陳漢章，〈爾汝篇卮言一則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8年3月2日，第4版，【文藝】。

37 陳漢章，〈爾汝篇卮言一則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8年3月2日，第4版，【文藝】。

38 傅斯年，〈論哲學門隸屬文科之流弊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8年10月8日，第4版，【文藝】。

來集結成書。<sup>39</sup>所謂的歌謠，這裡泛指當時各地的通俗歇後語，屬於平民或白話文學的部分。但此種看似有特定立場的活動，校內不論傳統或新思想的支持者均紛紛響應。他們都積極的提供歌謠、蒐集材料、甚至參與此編輯工作。這反映出新文化運動的部分精神，於此時期已可見容於北大校內。<sup>40</sup>這對提供了新潮社的成立來說，更是相當有利的一股校園氛圍。<sup>41</sup>

## 第二節 新潮社的成立背景與過程

新潮社的成立過程，由於正好處於北大校園風氣轉變的時期，加上此校風的轉變，亦與校內新文化運動的發展有著密切關係。故今將新潮社的成立過程，與當時北大校風變化及新文化運動間的關係做個整理，並分為幾個時期來敘述之。

39 〈北京大學徵集全國近世歌謠簡章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8年9月21日，第5版，【雜錄】。

40 像羅家倫也曾投了幾篇歌謠給劉復，並在與劉復的通信內容中，談到這個蒐集歌謠計畫獲得不錯迴響的內容。見〈羅家倫君與劉復教授往來之函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8年11月25日，第2版，【通信】。

41 值得一提的是，北大校方舉行這場蒐集歌謠的活動，更於日後影響了像顧頡剛這類新潮社社員的學術理路。有關這部分的研究，彭明輝先生已作過詳細的整理。彭明輝，《疑古思想與中國現代史學的發展》（臺北：商務印書館，1991年），頁171-173。

### 一、低調的醞釀階段：1917下半年

新潮社的成立，是經過一段時期醞釀的。最早可溯及1917年秋，幾個創社成員經常聚在一起談論籌組社團的事宜。若看傅斯年的回憶中所說，這時他們所討論的社團型態，就是日後新潮社的社團路線：

民國六年的秋天，我和顧頡剛君住在同一宿舍同一號裏，徐彥之君是我們的近鄰。我們幾個人每天必要閑談的。有時說到北京大學的將來，我們抱很多的希望，覺得學生應該辦幾種雜誌，因為學生必須有自動的生活，辦有組織的事件，然後所學所想，不至枉費了。而且雜誌是最有趣味，最於學業有幫助的事，是最有益的自動生活。再就我們自己的脾氣上著想，我們將來的生活，總離不了教育界和出版界，那麼，我們曷不在當學生的時候，練習一回呢？<sup>42</sup>

除傅斯年、顧頡剛、徐彥之外，當時參與的人還有潘家洵及羅家倫，這幾位以後都成了新潮社的骨幹。只不過當時談的一些構想都沒有立即去做。對此，傅斯年在回憶中這麼說：「當時僅僅是一種希望的意思，覺得赤手空拳，何從做起，簡直跟戲論差不多。中國的讀書人有一種『群居終日言不及義』的習

42 傅斯年，〈新潮之回顧與前瞻〉，《新潮》2卷1號，1919年10月，頁199。

慣，這個希望也是我們群居的一種消遣品，<sup>43</sup>他認為當時的討論，只夠做閒暇時聊天的話題，尚無能力能立刻付諸行動。

為什麼當時沒有能力呢？有學者認為關鍵在於沒有經費。<sup>44</sup>但筆者以為經費固然重要，但不是最大問題，以下二點才是主因：

首先，是北大校風開放的程度及對新式言論的包容度，在此時期仍未成熟。如在前節的內容中，有談到蔡元培在1916年底接手北大後，為了使該校躋身現代化大學所作的一些決策及變革，而這是北大校風徹底轉變的關鍵。<sup>45</sup>他先是任命陳獨秀為文學院院長，後又延攬留美學人胡適來北大任教。這兩人言論都很前衛，被保守派學者視為異端，當時蔡居然敢於起用，顯見其希望改造北大的決心。然而，即便他決心如此堅決，改革成果亦非一蹴可及。依筆者看來，至少在1917年，北大校內人士對於新式言論的接受程度，尚處於過渡時期。

43 傅斯年，〈新潮之回顧與前瞻〉，《新潮》2卷1號，1919年10月，頁199。

44 如李雲漢先生就認為，這些當時參與籌備社團討論的人都屬能文之士，但是在社團在創辦之初都需要經費，而錢在當時變成他們創辦社團時的第一難題。見李雲漢，〈羅志希與新潮雜誌〉，《傳記文學》30卷1期，1977年1月，頁49。

45 有關蔡元培在這段時期改革北大的詳細內容，蕭超然先生的著作中便曾將詳細的流程依時間作了一番整理。見蕭超然，《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》，頁69-78。及蕭超然等編，《北京大學校史1898-1948》，頁33-47。

舉例來說，胡適受聘為北大教授後，於1917年秋講授中國哲學史。當時胡適的年齡比許多學生都輕，致使一些長他的學生不服，<sup>46</sup>況且授課第一章，他便石破天驚的「丟開唐、虞、夏、商，徑從周宣王之後講起」，<sup>47</sup>顛覆傳統，當場令許多「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」的學生，「驟然作一個重大的打擊，駭的一堂中舌橋而不能下」。<sup>48</sup>因此，有學生就發起趕走胡適的活動，甚至拿胡適在《新青年》雜誌上所寫的新詩來加以嘲諷。<sup>49</sup>當時身為北大學生，並是日後國民社發起人之一的張國燾（1897-1979），其回憶中更指出1916年下半年到1917年底，北大校內保守與前衛思想之間毫無交集，仍似有一道無形的鴻溝存在，他說：

1917年春，陳獨秀任北大文科學長。他所主編的「新青年」月刊也在我們學校和書攤上買的到了，這刊物於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創刊，但北大同學知道這刊物的非常少。一九一七年一月，胡適在「新青年」第二卷第五號上發表了一篇「文學改良芻議」，接著陳獨秀在次一期又發表了一篇「文學革命論」，才引起同學廣泛的注意。……當時同學中尊重孔子學說、反對白話文的還佔多數。無條件贊成新思潮、徹底擁護白話文者雖

46 顧潮，《歷劫終教志不灰：我的父親顧頡剛》，頁40-41。

47 顧頡剛，〈自序〉，《古史辨》，頁36。

48 顧頡剛，〈自序〉，《古史辨》，頁36。

49 顧潮，《歷劫終較志不灰：我的父親顧頡剛》，頁41。



佔少數，但他們具有蓬蓬勃勃的熱烈精神。新舊之爭，就在課堂中、宿舍裏到處展開著。<sup>50</sup>

可見這時期的北大，校內仍把傳統文化思想奉為圭臬，而全盤否定新觀念的保守派更不在少數。故當「白話文」、「反傳統」等新思潮「侵入」北大校園時，自然要遭到極大的抵制了。<sup>51</sup>

除張的回憶外，一些其他北大學生的回憶也多持類似看法，在此不多作描述。<sup>52</sup> 在這段時間校內言論風氣尚未真正解

50 張國燾，《我的回憶》（一）（香港：明報月刊出版社，1971年），頁39-40。

51 如楊振聲的回憶中，提到「五四」以前的北大中文系，其系中兩名傳統派代表學者黃侃（1886-1935）及姚永樸（1861-1939），雖各擁不同文學體系，然「新文學運動時，他們彼此不罵了，上課都罵白話文」。楊振聲，〈回憶五四〉，載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，《五四運動回憶錄》（上）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79年），頁261。

52 據許德珩的回憶，蔡元培在北大校園內的革新，約到了1918年以後才逐漸見到成效。他提到「1918年統計，全校兩百多教員中，教授的平均年齡只有三十多歲」，而且這些教授們「思想多數傾向革新，這就給北大帶來了朝氣」，顯示新思想要到1918年，才真正普遍地被校內人士所接受。參見許德珩，《許德珩回憶錄：為了民主與科學》，頁66。又1916到1917年底之間，新舊立場間似乎處在一種絕對涇渭分明的狀態。如毛子水回憶這期間對於文學的看法，提到當時新舊兩派的支持者，是「文言文寫的不通或不好而贊成新文學的很多，文言文寫得很通很好而贊成新文學的很少」。參見毛子水，〈傅孟真先生傳略〉，載於《師友記》（臺北：傳記文學出版社，1967年），頁93。最好的情形，了不起就如羅家倫所說在同一寢室中，不同意對方立場但「道並行而不相悖」，壞的情況就像正文中所談會有人要發起把異己言論趕出校園的活動。見羅家倫，〈狄君武遺稿前言〉，收入《逝者如斯集》（臺北：傳記文學出版社，

放前，對日漸服膺胡適並轉而支持新派言論的傅斯年、羅家倫、顧頡剛等人而言，<sup>53</sup> 想成立一個以推廣新文化運動為宗旨的社團，當然困難重重。這便是1917年秋「新潮社」成立的構想，無法劍及履及的主因之一。

其次，出版一個刊物，相關人士應具備編輯、校對、翻譯等相關經驗。然1917年底以前，學生根本沒機會培養這些能力。原因之一，是首份校園刊物《北京大學日刊》剛問世不久；原因之二，是當時北大校內亦無類似文字編譯性質的社團出現，故學生沒有太多機會能累積足夠的經驗。若參照前節筆者整理的表2-1，可發現至1917年底，北大校園社團雖初具規模，但尚處萌芽階段而不夠多元。又，國文研究所等這類社團，其體質在當時嚴格來說更稱不上社團，倒是現在中學裡的輔導課，即在正課之餘加開課程並准許學生討論。其餘社團也多跟文字編譯、創作等實務無直接關係。

此外，從中國當時的大環境來看，亦存在著對新潮社這類

1967年），頁211。

53 據羅家倫的回憶，1917年入秋以後，顧頡剛曾找傅斯年去聽胡適的課，傅斯年聽過課後對胡適的觀點逐漸產生敬服之心。後來並且邀集一些同學去胡適的家中「客客氣氣的請教受益」。正因為如此，才讓傅斯年在此時轉變新文化運動的強烈擁護者。這段期間，傅斯年還會在他的宿舍「和他一班不速之客的朋友羅志希等，在高談文學革命和新文化運動」。由此可見，此時胡適他們所倡導的觀念，給了傅斯年、羅家倫這些新潮社的創始成員很大的啟發，並讓他們相當的佩服。見羅家倫，〈元氣淋漓的傅孟真〉，《逝者如斯集》，頁166-168。

社團成立上的不利因素。

例如，當時商務印書館這家大型出版社，其發行的《學生雜誌》、《東方雜誌》和《婦女雜誌》，有些欄位（如文藝、通信等）可開放給讀者投稿。而像《學生雜誌》，更把「作為全國學生界互相連絡之機關」當作該雜誌的宗旨之一。<sup>54</sup>所以，我們還可把《學生雜誌》，視作當時最歡迎在學生投稿的雜誌。如沈雁冰（即茅盾，1894-1988）、胡愈之（1896-1986）等人，更在還是學生的1916至1917年時，投稿該雜誌並獲得刊登。也因這份淵源，使他們後來能加入《學生雜誌》的編輯工作。其他大型出版社（如中華書局），這時期也有類似的機制。

只是，各類雜誌訂有獎掖學生投稿的辦法，雖看似是磨練文字表達能力的最好機會，但這些由大型出版社所出版的刊物，在此時仍多具濃厚傳統文化色彩，體裁亦以文言文為主。而在當時立場傳統的商務，其出版的雜誌又非常暢銷，甚至1917年的總銷售額仍有146,000元。<sup>55</sup>為何立場傾向支持傳統的出版社，仍在這時的文化產業中佔有市場優勢？這恰好反証了新文化運動的理念，至少在1917年的知識圈中仍屬弱勢。

相形之下，與新文化運動劃上等號的代表刊物《新青年》，

54 王飛仙，《期刊、出版和社會變遷：五四前後的商務印書館及學生雜誌》（臺北：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論文），頁58。

55 張元濟著、張人鳳整理，《張元濟日記》（上）（石家莊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1年），1918年12月25日條，頁670。

在這時期就只能用慘澹經營來形容了。《新青年》的前身《青年雜誌》，自1915年9月創刊以來，所得到的迴響本來就不大，包括贈閱才不過一千份。<sup>56</sup>即便翌年該雜誌改組成《新青年》後，其風格在這時（1916至1917年）裡仍不討喜。甚至在1917年底，代理發售的上海廣益書局，還曾想以「不能廣行」的理由，中止這份刊物的出版，好在經陳獨秀等人一番交涉才得以續刊。<sup>57</sup>難怪連負責人陳獨秀，在此期間也不免有「本誌出版半載，持論多與時俗相左，然罕受駁論，此本誌之不幸，亦社會之不幸」這種千山我獨行的感嘆了。<sup>58</sup>當時在文化界已小有名氣的陳獨秀，尚且有這種無能為力的感觸，更遑論人微言輕的一般學生，想在主流刊物上發表白話文與新思潮相關文章的難度。須知，這不只是北京大學當時的景況，更是中國大環境的縮影。

## 二、利於社團成立的轉折點：1918年上半年

進入1918年，局勢逐漸變化的對新潮社成立有利。特別是1918年上半年的局勢變化，讓新潮社的成立出現了曙光。這可從下列幾件事情來看：

56 王飛仙，《期刊、出版和社會變遷：五四前後的商務印書館及學生雜誌》，頁60。

57 魯迅，〈致許壽裳〉，《魯迅全集》第11卷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05年），1918年1月4日，頁357。

58 陳獨秀，〈通信〉，《新青年》2卷1號，1916年9月，頁7。

第一，是 1918 年上半年，北大有不少新社團相繼成立。其中有一些社團的宗旨跟新文化運動的某些意涵相通，這讓入社的人，能從參與社團活動中了解到新文化運動的一些觀點。進德會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。

進德會是校長蔡元培所發起的社團，成立之因，是蔡有鑒於北大校風保守和腐敗由來已久。從他接任校長之初，所熟知的北大名聲是「聲名狼藉」可見一斑。<sup>59</sup> 所以，若要讓北大整體改頭換面，外在制度當然要變，道德、人格特質等內在精神也要潛移默化，才有機會真正煥然一新。<sup>60</sup> 於是蔡便於 1918 年初發起進德會，希望藉由這個社團的宗旨，來匡正學校師生的陋習。而該社並於 1918 年 1 月 19 日，在《北京大學日刊》上公告成立。<sup>61</sup>

在進德會的發起文告上，蔡元培明確指出「今人恆言：西方尚公德，而東方尚私德。又以為能盡公德，則私德之出入曾不足惜，意是誤會也。吾人既為社會之一分子，分子之腐敗，不能無影響于全體」。並提及這幾年中國政治與社會腐敗，尤以北京為甚。因此，他更期許進德會成立後，能「治起於衰亂

之中，用心尚羸弱，及歷升平而至太平」。而他將進德會的會員，分成甲乙丙三個等級：甲種會員是「不嫖、不賭、不娶妾」，此為進德會會員基本規範；乙種則增加不作官吏、不作議員兩項；丙種另加不吸煙、不喝酒、不吃肉三項。<sup>62</sup> 這八項規章，某種程度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一直以來所遵循的一些傳統，到了後來反而變成一種陋習，況且也不符合現代化西方國家的精神。而進德會所觸及的問題，正與當時新文化運動倡導者的觀點不謀而合，因此頗能相得益彰。<sup>63</sup>

進德會成立之後，其主張獲得校內許多學生與教員的支持，加入者頗眾。根據 4 個月後的統計，進德會的成員便有 468 人之多，其中 301 人為學生。<sup>64</sup> 而此時北大學生總數不過 1,980 人，<sup>65</sup> 約占六分之一，可見其在校內的重要性與影響力。而 1918 年以後還有不少像進德會這樣的新創社團，其宗旨都能跟新文化運動部分內涵相通（可參見本章第一節的表 2-2）。

59 蔡元培，〈致吳稚暉函〉，收入高平叔主編，《蔡元培文集》【十】（臺北：錦繡，1995 年），頁 374。

60 蔡元培，〈致吳稚暉函〉，收入高平叔主編，《蔡元培文集》【十】，頁 374。

61 蔡元培，〈北京大學之進德會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9 年 1 月 19 日，第 3 版，【紀事】。

62 上述條文內容，皆見蔡元培，〈北京大學之進德會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9 年 1 月 19 日，第 3 版，【紀事】。

63 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學校長時的演講，就當著全校同仁說他擔任校長時期有三個目標希望能達成，分別為「抱定宗旨」、「砥礪德行」和「敬愛師友」，這些口號的詳細解釋有些確實能和新文化運動的理念相通，並且也變成後來蔡發起進德會的內在精神。見蔡元培，〈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〉，收入高平叔編，《蔡元培全集》【三】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4 年），頁 5-7。

64 蔡元培，〈校長致進德會會員公函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8 年 5 月 24 日，第 1 版，【本校佈告】。

65 此根據 1918 年 8 月的統計。見蕭超然等編，《北京大學校史 1898-1948》，頁 46。

這些社團的活動，逐漸讓教員與學生能適應新文化運動者的言論，同時也為新潮社日後的創立打下了良好基礎。

第二，是 1918 年以後，北大學生比以前多了不少編輯、撰文、翻譯及出版等實務機會，因而能在校園內迅速累積經驗，這些將來都成為新潮社成立及發行《新潮》時的基本能力。

以《新青年》來說，這份當時被視為代表新派學者言論的刊物，在胡適、陳獨秀、錢玄同、陶孟和等北大教授為主的編者群，於校園內的授課與演講下，新思潮逐漸在北大學生圈中發酵，並總算在這年看到了校內新思潮散播的成果。1918 年 1 月，《新青年》刊出了北大學生傅斯年的〈文學革新申義〉，<sup>66</sup>與羅家倫的〈青年學生〉兩文，<sup>67</sup>大膽針對新思潮的部分議題作出公開呼應，這成了北大學生公開響應新文化運動的先聲。

有人起頭後，其他學生便敢於跟進發表與新思潮議題有關的文字，而這也正好讓這些人（日後多成為新潮社的發起成員）於此時逐漸架構出與新思潮有關的集體與個人思維，以及磨練出他們對文字表達的能力（見表 2-3）。

除在《新青年》上的投稿外，1918 年後的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也出現不少能磨練文字表達能力的機會。像北大校內以研究課業與學術為主的社團，會定期召開研究會為最，開會時

66 傅斯年，〈文學革新申義〉，《新青年》4 卷 1 號，1918 年 1 月。

67 羅家倫，〈青年學生〉，《新青年》4 卷 1 號，1918 年 1 月。

需有學生任記錄員。進入 1918 年後，校方更要這些社團的會議紀錄，必須刊於《北京大學日刊》上，這無形中也促使了加入這類社團的學生，必須加強文字編排（潤稿）的能力。例如傅斯年，就曾在其參與的社團中做過文字紀錄與整理的工作，而他所做的紀錄，在《北京大學日刊》上也刊登出來過。<sup>68</sup>

有了《新青年》與《北京大學日刊》這兩個管道，才華能力受到肯定的北大學生，甚至還可獲得兼任翻譯與特約記者的機會，直接參與出版刊物相關之工作。例如新潮社發起人之一的吳康（1897-1976），在《北京大學日刊》改組後（1918 年 2 月 18 日），於 3 月起受邀陸續在《北京大學日刊》上翻譯日本學者談西方生物學的學術著作，定名為〈科學鱗爪〉。<sup>69</sup>又如羅家倫，他在投稿《新青年》後受到編輯群賞識，應邀參與 1918 年 6 月易卜生（Henrik Ibsen, 1821-1906）專號中〈娜拉〉一劇的翻譯。<sup>70</sup>同年 7 月暑假，羅更受《北京大學日刊》請託，任北大學生西山旅行隊特約通信記者，隨隊報導旅遊見聞。<sup>71</sup>這些歷練都成就了他們後來出版《新潮》時所需的能力。

68 傅斯年，〈文科國文門研究所報告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8 年 1 月 17 日，第 3 版。

69 吳康，〈科學鱗爪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8 年 3 月 1 日—3 月 26 日，第 5 版—第 6 版；1918 年 6 月 7 日—6 月 10 日，第六版。

70 羅家倫，〈娜拉〉【一】【二】幕（翻譯），《新青年》4 卷 6 號—易蔔生專號，1918 年 6 月。

71 〈日刊特約西山通信員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8 年 7 月 13 日，第 2 版，【本校紀事】。



表 2-3：新潮社創始社員在社團成立前公開發表的文章

作者	文章名稱	刊登處	刊出時間	文章主軸
傅斯年	〈文學革新申義〉	《新青年》	1918.1.15	呼應文學革命，並提出自己觀點。
羅家倫	〈青年學生〉	《新青年》	1918.1.15	批判當時青年學生受傳統觀念影響所造成的陋習，並主張改革。
張崧年	〈集合論述誼〉	《北京大學日刊》	1918.2.8	介紹西方數學理論。
傅斯年	〈文言合一草義〉	《新青年》	1918.2.15	呼應白話文運動，並就自己觀點談論白話在寫作文章時該如何使用。
康白情	〈味蔗屋書筭記〉	《北京大學日刊》	1918.2.21-3.2， 1918.3.4， 1918.3.7， 1918.3.14-4.26	分享自己在讀中國古典各著作時的心得，並提出自己對這些學問的觀點。
毛準	〈書「書爾汝篇後」〉	《北京大學日刊》	1918.2.22-2.23	此文為回應北大講師劉鼎和專文反駁《北京大學日刊》轉載另一個胡適留美時的文章〈爾汝篇〉，毛反對劉的看法，並寫出自己的意見。
毛準	〈書「書爾汝篇後」後補〉	《北京大學日刊》	1918.2.25	為〈書「書爾汝篇後」〉一文的補充。
毛準	〈書吾我篇後〉	《北京大學日刊》	1918.2.26-3.1	回應《北京大學日刊》轉載另一個胡適留美時的文章〈吾我篇〉，毛提出跟胡適不同的看法。
顧頡剛	〈上北京大學圖書館書〉	《北京大學日刊》	1918.3.4-3.9， 1918.3.12-3.16	給當時北京大學圖書館一些他認為需改進的意見。
傅斯年	〈中國學術思想界之基本誤謬〉	《新青年》	1918.4.15	點出中國學術長期累積的問題並加以分類批判。
傅斯年	〈中國歷史分期之研究〉	《北京大學日刊》	1918.4.17-4.23	對於中國歷史的時代分期，提出自己的看法。

作者	文章名稱	刊登處	刊出時間	文章主軸
譚鳴謙	〈哲學對於科學宗教之關繫論〉	《北京大學日刊》	1918.4.27-5.18	以自己的觀點，來看科學、哲學與宗教三者之間有無互通及可以調和的地方。
俞平伯	〈春水〉（詩）	《新青年》	1918.5.15	白話詩的創作。
陳嘉謨	〈撥告子揚雄韓愈之性說〉	《北京大學日刊》	1918.5.20-5.25	分析告子、揚雄、韓愈這三人對萬物本性的看法。
羅家倫	〈西山紀遊〉	《北京大學日刊》	1918.7.13， 7.25，8.6	一系列關於西山的報導。
黃建中	〈中國學術源流論〉	《北京大學日刊》	1918.7.18-7.23	談中國各家學術的來源，黃分析結果認為多來自西方。
傅斯年	〈論哲學門隸屬文科之流弊〉	《北京大學日刊》	1918.10.8	傅斯年提出建議，認為北大的學科分類中，哲學不應該隸屬文科而該分在理科。
陳嘉謨	〈電學之緣起及其在學術上之位置（電子說）〉	《北京大學日刊》	1918.10.11-10.16	探討電氣學的起源及介紹其在科學上的重要性。
張崧年	〈勸讀雜誌〉	《新青年》	1918.10.15	鼓勵學生多讀雜誌以增廣見聞。
傅斯年	〈戲劇改良面面觀〉	《新青年》	1918.10.15	傅斯年談論他理想中的中國新式戲劇。
傅斯年	〈再論戲劇改良〉	《新青年》	1918.10.15	為〈戲劇改良面面觀〉的論點補充。
譚鳴謙	〈心理學情緒分類學說之評論〉	《北京大學日刊》	1918.11.6-11.13	以科學的方式來解釋人在情緒上面的變化。
羅家倫	〈歌謠選（六〇）—（六三）〉	《北京大學日刊》	1918.11.12-11.18	提供各歌謠的材料。

資料來源：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8年1月11日—12月24日。《新青年》4卷1號—5卷6號，1918年1月—12月。

以上種種，顯示 1918 年的北大校園變化，讓成立新潮社的想法，由原先的「戲論」、「群居的消遣品」，變成是一件真正可行的事。而在校外，1918 年上半年發生的政治事件，更演變出有利於新思潮發展的環境。

當時北洋政府掌權者段祺瑞（時任國務總理，1865-1936），1918 年 3 月至 5 月間，派代表與日本進行了「中日陸軍共同防戰協定」，答應日本開出在北滿洲的利權，及在外蒙古駐軍的喪權辱國條件，藉此換取金援強化其軍備。<sup>72</sup> 消息在留日中國學生中傳開後，義憤填膺的留學生於 5 月間集體返國，在上海成立「留日學生救國團」，揭發北洋政府的賣國行徑，國內輿論為之譁然。5 月 21 日，以北京大學、北京高等師範學校、北京法政專門學校及北京工業專門學校為首的 2,000 多名學生，更集結起來示威遊行，<sup>73</sup> 抗議北洋政府與日本簽訂的軍事協定，一路遊行至當時代理總統馮國璋（1859-1919）所在的總統府。最後馮親自出面向學生保證，說他的政府絕不

72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纂委員會編，《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民國七年（一九一八年）一至六月份》（臺北：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，1981年），頁 648-652。而對此事件較為詳盡的研究，更可參見黃福慶先生的論文。黃福慶，〈五四前夕留日學生的排日運動〉，載於張玉法等編，《中國現代史論集》【第六輯 五四運動】（臺北：聯經出版社，1990年），頁 139-165。

73 〈中國大事記 5 月 21 日條〉，《東方雜誌》15 卷 7 號，1918 年 7 月，頁 195。

會做任何有悖於中國利益的事情，才稍微平息了當時的眾怒。<sup>74</sup>

此次北京高等學校間的學生大串聯遊行事件，被稱為抗日請願遊行，事情結束後還餘波盪漾了一陣子。當時北大校長蔡元培甚至被迫為學生的行為負責，他以督導不周的理由引咎辭職，後經各界強烈聲援下才得以留任。<sup>75</sup> 而這次的學生愛國遊行，對於新思潮往後在社會上的傳播是很有利的。<sup>76</sup> 且北大學生因這次遊行打響了知名度，並扭轉了先前給人「聲名狼藉」的壞印象。後新潮社能順利成立且雜誌也獲得廣大迴響，1918 上半年社會上對北大觀感的轉變，當為一重要因素。

### 三、社團付諸於實現的階段：1918 年下半年

綜合上面的整理，可得知 1918 年整年局勢的轉變，特別是上半年校內外一些關鍵事件的影響，使得北大本身的環境，

74 當時馮國璋最後接見了段錫朋、雷國能、徐德珩、王政、易克巖、方豪（上列北大學生代表）、熊夢飛（北京高等師範學校）、鄧祥海、夏秀峰（上列北京高等工業學校代表）等共 13 名代表。〈紀事〉，《教育雜誌》9 卷 6 號，1918 年 6 月，頁 44-45。並載於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纂委員會編，《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民國七年（一九一八年）一至六月份》，頁 648-649。

75 遊行事件發生後，蔡元培就要辭去校長之職來負責。參見〈本校校長及各科學長決意辭職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8 年 5 月 23 日，第 2 版，【本校紀事】。但後來得到全校職員、學生的強烈聲援，所以最後政府方面才讓蔡元培留任。參見〈校長學長已允留職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8 年 5 月 24 日，第 2 版，【本校紀事】。

76 張國燾，《我的回憶》（一），頁 44-45。

都逐漸形成一種能包容新思潮發展的氛圍。所以，新潮社的發起者也趁著這個機會，在1918年下半年開始進行新潮社的創立。當然，前面已費了1年多的醞釀階段，此時公開來著手籌組社團會比較有頭緒。所以在建立社團的過程上，大約僅花了2、3個月的時間就籌辦成功。

先是於1918年秋，傅斯年再度跟徐彥之商討有關成立社團的事宜，就此展開了新潮社正式成立的第一步。<sup>77</sup>對此，徐彥之作了一個相關計畫整理，並發現資金會是他們在創社後最欠缺的部分。所以他們便向他們的老師輩，當時擔任北大文科學長的陳獨秀求助。陳獨秀很熱心的幫忙此事，並說會用學校名義來提供新潮社的所需資金。有了穩定的資金來源，傅、徐二人就加快腳步「約集同人商量組織法」了。<sup>78</sup>也因為他們積極的在校內奔走，所以這時的創社，過程上獲得了不少師長輩的援助。<sup>79</sup>

77 傅斯年，〈新潮之回顧與前瞻〉，《新潮》2卷1號，1919年10月，頁199。

78 他們還選了羅家倫跟康白情。甚至老師輩的胡適都有興趣，後來還擔任該社的顧問。傅斯年，〈新潮之回顧與前瞻〉，《新潮》2卷1號，1919年10月，頁199。

79 像許德珩的回憶中，許就認為比起《國民》，校方給予《新潮》更多的支持與關愛。許特別提到學校每個月都有補助新潮社400元，且讓新潮能夠在北大校內公開掛上招牌。對於校方支持新潮社的程度，許德珩在語氣上似乎有一種不平之感。見許德珩，〈回憶國民雜誌社〉，收入張允侯編，《五四時期的社團》【二】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1979年），頁38-39。

同年10月13日，新潮社召開了首次的成立預備會。確定的該社團與雜誌的名稱為「新潮」（英文名稱為The Renaissance，即帶有啟蒙的意味）。<sup>80</sup>11月19日，召開第2次社團成立預備會。當時任北大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（1889-1927），還熱心的提供了圖書館中的一房間給新潮社。<sup>81</sup>12月3號，新潮社在《北京大學日刊》上正式公告成立，<sup>82</sup>明確地將社團宗旨及主要社務一一列出。公告上指出「同人者集合同趣組成一月刊雜誌，定名曰《新潮》，專以介紹西洋近代思潮，批評中國學術上、社會上各問題為職司。不取庸言，不為無主義之文辭」，<sup>83</sup>很清楚的宣示了該社團的宗旨。並在該份公告的最後，預告了第一期的《新潮》，將於隔年1月1日發行。<sup>84</sup>從此，正式開啟了新潮社三年多的運作。<sup>85</sup>

80 傅斯年，〈新潮之回顧與前瞻〉，《新潮》2卷1號，頁200。

81 李大釗也是新潮社在成立過程中給予很大幫助的師長輩之一。傅斯年，〈新潮之回顧與前瞻〉，《新潮》2卷1號，頁200。

82 〈新潮雜誌社特別啟事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8年12月3日，第2版，【本校佈告】。

83 〈新潮雜誌社啟事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8年12月3日，第2版，【本校佈告】。並收入張允侯，《五四時期的社團》【二】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1979年），頁46。

84 〈新潮雜誌社特別啟事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8年12月3日，第2版，【本校佈告】。

85 如以《新潮》雜誌的創刊與結束，當作新潮社該社團真正營運期間的話。從1919年1月1日的創刊號，至1922年3月的最後一期（3卷2號），新潮社共運作3年2個月的時間。

## 小 結

新潮社在 1918 年 12 月 3 日得以成立，從出現社團概念到真正成立，歷時近一年半。透過本章整理，可知影響其成立過程的背景上，有著特殊之處。

首先，是蔡元培在北大校內施行的改革，讓校園內的環境有了變化。蔡於 1917 年 1 月到任後，藉強制與誘導的雙重方式，來逐步落實北大體質的改變。而在蔡持續近 1 年的大力整頓後，終於，1918 年之後北大的校園風氣，變的開放且多元。而且師生的品德及個人修為，也逐漸跳離了早期的陋習。這是北大形象變好的轉戾點，也使新潮社因而有了成立的最佳機會。

只是，雖蔡元培甫擔任校長就推動北大校園改革，但 1917 年尚屬新舊制度相互矛盾的過渡期。所以，即使在 1917 年談成立新潮社已有了一些草案，但是並非最佳時機，在當年只能選擇讓成立社團的計畫胎死腹中。

到了 1918 年後，除了已可看到北大校內的改革成果外，1918 年 5 月間在學生領導下發生的救國運動（抗日請願），更有助於新思潮在北大校園內外的推展。若用傅列克（Richard Flacks）氏的研究思維方式，來解釋有助於新潮社成立現象的發展，即是透過了「愛國」這個模糊的概念，許多與愛國較無

關的概念，也可用模糊化或涵化的方式把它收於其中。<sup>86</sup>所以，想響應新文化運動的學生，藉由這波愛國風潮而有了崛起的機會。再加上北大的改革，讓新潮社在 1918 年下半葉，終於獲得了成立的良機。

86 Richard Flacks “Social and Cultural Meaning of Student Revolt” in Edward E. Sampson and Harold A. Korn (ed.), *Student Activism and Protest* (San Francisco:1970), pp 122.